

『中國語言文學作品與史料選』系列教材

中國古代文論 作品與史料選

孫敏強 主編

孫福軒 副主編

為文之用心也。昔涓
古來文章，以雜
黎獻紛雜，而
飛實，制作而
聲氣乎風雷，
之堅，是以君
齡，乃夢彩雲
禮器，隨神而南
乃小子，垂夢
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
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
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中國語言文學作品與史料選』系列教材

中國古代文論 作品與史料選

孫敏強 主編
孫福軒 副主編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古代文論作品與史料選 / 孫敏強主編. —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308-13290-9

I. ①中… II. ①孫… III. ①中國文學—古代文論—
文學研究 IV. ①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09530 號

中國古代文論作品與史料選

孫敏強 主 編

孫福軒 副主編

責任編輯 宋旭華

文字編輯 施馬琪

出版發行 浙江大學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號 郵政編碼 310007)

(網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張 24.5

字 數 454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308-13290-9

定 價 38.00 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裝差錯 負責調換

浙江大學出版社發行部聯繫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總 序

吳秀明

假如將迄今為止種類繁多的中國語言文學“選本”進行分類，我以為大體可分為非專業與專業兩種類型。前者，主要針對非中文專業的學生而言，也包括社會上的一般語言文學愛好者，它側重於作品的詩學價值；後者，則主要針對中文專業的學生而言，它除了詩學價值外，還要兼及史學價值。本叢書屬於後者，它帶有專業化、專門化的性質和特點，其初衷是為他們提供詩、史兼備，並與現行的“通史”（語言史、文學史）教材相配套的一套“選本”，以滿足厚基礎、寬口徑、高素質和創新型專業人才培養的需要。這也是中文核心主幹課程的主要教材。按時下的類型劃分，不妨稱之為研究型教材。

衆所周知，現有的中文專業學生使用的“選本”儘管在選擇的標準、內容、形態、方式等方面各具特色，存在着不少差異，但在基本範式和總體思路上彼此卻表現了某種驚人的同構性：那就是選文的對象和範圍都鎖定在文學作品上，它向我們呈現的幾乎都是清一色的、當然也是美輪美奐的經典之作。所謂的“選本”，其實就是“文學作品選”，它也只向“文學作品”開放，其所內含的“詩學”指向是非常明確的。文學作品作為特定歷史階段文學創作的表徵和載體，它凝聚了時代思想藝術的精華，對中文專業的學生來說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尤其是近些年因諸多原因導致的審美貧乏症，在往往只記住概念、名詞而對作品整體美、內在美不知何物的情況下，更是具有非同尋常的特殊意義。也因這個緣故，我對近些年來各高校一改舊觀而普遍重視經典作品的教學理念表示理解和贊賞，並認為將來還有繼續強化之必要。不過話又說回來，這僅僅是中文教育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它也不能包辦和取代其他。實踐表明，作為一個傳統基礎系科，中文教育的空間還是很大的，各個專業彼此間的辦學目標、層次、規格也不盡相同。特別是一些學術積累比較深厚、師資力量比較雄厚、辦學水平比較高的系科，更是已在這方面作出了不少探索，這也是當下中國乃至海外中文教育的客觀歷史和現實。而對研究型教學來說，到底如何在讀好、讀懂、讀深經典作品的同時增加學生的根源性學養，培育他們良好的研究習慣與學風，為將來繼續進行專業深造和可持續發展打下扎實的基礎。一句話，到底如何拓寬學生的思維視野和知識結

構，培養他們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的能力，這是當前中文教育亟須解決的一個問題，也是研究型教材的主旨所在。

浙大中文系推出的這套涵蓋文藝學、語言文字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五個二級學科、總計十二卷的《中國語言文學核心課程作品與史料選》，就試圖在這方面進行探索。我們編選的這套“選本”，看似好像只是在“作品”之外增加了一些“史料”，但它却反映和體現了我們對教學、研究及人才培育理念上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這套“選本”強調客觀呈現，注重歷史還原

這裏所說的呈現和還原，當然包括“選本”所選的文學作品在這方面的功能價值——文學作品尤其是現實主義文學作品，誠如經典作家所說的那樣，它的“書記官”的功能價值，使它在反映歷史和現實生活的畢肖酷似上往往達到連史家都嘆服不已的程度；但主要還是指被我們特別引進的這些文獻史料：如序跋、詩話、傳記、碑文、筆記、書信等，現代以降的如社團、傳媒、文件、講話、批示、社論、紀要、評論等。這些形態各異史料的編選，不僅有效地拓寬了原有“選本”的內涵和外延，使之在整體構成上產生了革命性的擴容，而且還以其物化的形式引領我們穿越時空隧道，返回到彼時彼地的那個時代的語境與場域，與“作品”形成了富有意義的對話關係。史料作為中國語言文學的載體，它原本就是屬於歷史的，在它身上積澱了豐富的歷史信息；而文獻史料作為史料的重要組成部分（還有一種史料是實物史料），它憑借語言文字同時兼具能指與所指的雙重功能，在還原和營造歷史尤其是歷史現場感方面還有自己獨到的優勢。因此它特別適用於文學作品的歷史解讀，歷來備受重視，成為自古至今人們解讀文學作品的重要參考和佐證。從某種意義上講，作品與史料是一對孿生體，它們彼此具有難以切割的血緣聯繫。如果說作品是懸浮在空中的一種空靈的感性存在，那麼史料就是緊緊扎根在大地之上的一種具體切實的物態存在。也正因此，史料的有無、多少以及真實與否，史料意識的自覺與否以及實踐運用的程度如何，不僅直接關涉和影響着具體作品的解讀，而且也反映乃至決定着整體中文教育的水平和質量。中文教育的睿智與睿智的中文教育，都十分注意作品與史料之間的內在關聯，而不是將它們彼此孤離割裂。王國維所謂的治學“三互證法”，即“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取地下之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①可以說是對此的精闢概括。他的《宋元戲曲考》以及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梁啟超的《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胡適的《中國章回小

^①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20頁。

說考證》、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阿英的《晚清小說史》、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姜亮夫的《楚辭通故》、夏承燾的《唐宋詞人年譜》等作，都可以稱得上是這方面的典範。在他們那裏，史料經過發掘、勘誤、訂正、轉化、處理，不僅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而且成爲還原歷史、破譯作品奧秘的一個重要的載體。許多長期以來的語言文學之“司芬克斯之謎”，也因之得到了合理解釋。

北大中文系教授溫儒敏有感於“專業閱讀”存在的經典作品與當代讀者之間的“歷史隔膜”，在十年前曾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主張，叫“三步閱讀法”，其中第二步爲“設身處地”，就是借助和調動文學史及文化史知識，再融會自己的想象，努力“回到作品產生和傳播的歷史現場”。^①我們之所以在“選本”中增加了史料，其實也就是借助於史料“設身處地”地“回到作品產生和傳播的歷史現場”。在這裏，史料一方面可以很好地起到營造歷史氛圍的作用，這對因“歷史隔膜”造成的各種主觀隨意或過度闡釋無形之中形成一種防範和反彈；另一方面它也引導我們情不自禁地進入到特定的歷史規定情境之中，以“了解之同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同一境界……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②，從而對作品作出更加精準到位、也更合乎情理的解讀。當然，重視史料之於還原歷史以及參證和解讀作品的功能，絕非意味它可以取代對作品的藝術分析，用所謂的“史學價值”來代替“詩學價值”，那同樣是不可取的。在“作品與史料”或者說在“文學與史料”的關係問題上，我還是比較贊賞一位年輕學者的這樣一種說法：“勇敢地跨出樊籬，而更豐富地回返自身。”^③這可能更合適、更接近溫儒敏所說的“專業閱讀”，也更符合中國語言文學的屬性和趣味。

二、這套“選本”倡導研究意識，培養學術興趣

這也是研究型教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它主要體現在選文以及選文的注解上，也體現在對史料的選擇上。在這些地方，本“選本”努力倡導研究意識，體現研究理念：一方面用研究的眼光進行選與注，在選什麼、怎樣選問題上體現史家的眼光、學者的思維和素養，使之超越庸常而具有一定的學術含量；另一方面調動和激發學生的學術興趣，從選文、注解特別是從史料那裏切入探尋問題，進行必要當然也是初步的學術訓練。這裏所謂的研究，就史料而言，主要有以下兩個向度：（一）立足史料，以史料爲基點向社會學、歷史學、文獻學、文化學、政治學、

① 溫儒敏、趙祖謨主編：《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9頁。

②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册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9頁。

③ 金理、楊慶祥、黃平：《以文學爲志業——80後學者三人談》，《南方文壇》2012年第1期。

心理學輻射出去廣泛地涉及彼時彼地的“社會關係總和”，從那裏尋找質疑和問題的點，在“跨界”的反觀中達到對研究對象的新的認知，當然也包括新發現或新引進的地下新史料、域外新史料；以此為基點研求問題，不僅可以開拓一個新的學術領域，而且還能進而演化為一個“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陳寅恪語）。20世紀上半葉中國四大文獻史料甲骨文、敦煌遺書、居延竹簡、大內檔案發現對中國文學研究產生的重大影響，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二）通過史料與作品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它們彼此之間潛在的矛盾、牴牾和裂縫，從中思考、質疑和發現新的問題，形成問題意識。如南朝梁顧野王所撰《玉篇》中的“今上以為”一詞條，以往的一些語言研究者往往將“今上”解讀為當時的“梁武帝”，認為這是顧野王在引用梁武帝的看法，借以說明當時對異體字的重視。而最近有學者在對《玉篇》殘卷全面校勘和語詞及書寫分析的基礎上，對此作出了全然不同的正確解讀——原來此處的“今上以為”實際是“今亦以為”的訛誤，^①於是最終證否了鈔本裏唯一的“今上以為”與“梁武帝的看法”有關的猜想。大量事實表明，中國語言文學中的很多問題往往都源於史料，正是對這些本源性的史料的精心收集、整理和研究，特別是對這些史料與作品裂縫的敏銳發現、質疑和把握，人們才從習見的話題中翻出新意。這也可以說是迄今為止浙大中文系不少優秀學生學位論文或學年論文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吧。像2005屆一位本科生的畢業論文《論明初詩僧姚廣孝及其詩文》，就是在老師的指導下在編寫《姚廣孝年譜》的基礎上將其置於元末明初風雲變幻的語境下進行考察，令人信服地作出了自己的結論。該文後以《詩僧姚廣孝簡論》為題刊發於《文學評論》2006年第5期。這就從一個側面證實研究意識培養的重要和必要。

當然，文學研究是很複雜的，它的如何進入和展開因人因對象而異，有不同的範式和路徑，也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作為一個“選本”，它對學生研究意識的培養主要是引導，而不是剛性的指令，且在本科階段不可操之過急，對學生提出不切實際的太高要求。但無論如何，強調研究意識的培養，強調對本源性史料尊重的實事求是學風，強調必要的學術訓練，對學生來講不僅十分必要，而且須臾不可或缺。可能是受西方文化和學術思想的影響，也與現行的體制有關，中文教育長期以來重“思想闡釋”而輕“史料考據”。尤其是“三古”（即古代文學、古代漢語、古典文獻）以外一些新興或比較新興學科以及相關課程，這個問題似乎顯得更突出，也更嚴重。這就使中文教育尤其是某些作品的解讀無形之中被空殼化了，它似乎變成了某種“思想”的簡單符號或工具而失去了自身的主體性。這

^① 參見姚永銘：《可疑的“今上”——〈原本玉篇殘卷〉校讀劄記一則》，《漢語與漢語教學研究》第2期，日本櫻美林大學孔子學院，東京東方書店2011年7月。

種“思想”在以前是政治學、社會學的，它也被强行納入政治學、社會學視域中進行解讀；現在則被納入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視域中進行解讀，從觀念、思維到概念、術語完全是西式的。一切都效法西方，以是否符合剛引進的西方某某主義為取捨標準，而很少顧及作品的“歷史語境”和自身的實際情況，更沒有很好地考慮與中國固有、迄今仍然富有價值的傳統思維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對接。這樣的解讀貌似時尚，實則用虛蹈空洞的所謂“思想”（準確地說是“西方思想”）代替具體而微的藝術分析。這樣一種不及物的研究，它往往不可避免地對作品進行粗暴圖解和肢解，顯然是不可能真正發現美、洞察美的。為什麼現在不少中文系學生對經典作品反應比較冷漠，感受不到其中妙處，先入為主地用某種所謂的“思想”去套作品，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需要指出，在時代整體學術風氣的影響下，中文教育重“思想闡釋”而輕“史料考據”的現象在最近一些年程度不同地有所改正。在文藝學、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那裏，開始出現了由單一的“思想闡釋”向“思想闡釋”與“史料考據”的雙向互融的方向發展。這是很可喜的，它標志着中國語言文學教學和研究出現了重大的“戰略轉移”。但這僅僅是開始，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由於西學在中國的強勢存在，也由於學術浮躁風的盛行，上述現象還沒從根本上得到改觀。據說前幾年有人在做“重返 80 年代”研究時去採訪韓少功，曾把新時期的一次重要的文學自覺運動“尋根文學”，說成是因為政治“壓力之後的不得已而為之”的，弄得韓少功很鬱悶很生氣。^①這裏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誤讀，主要原因在於它不是從“事實”（“史料”）而是從“思想”出發進行。陳寅恪先生在 1936 年曾批評“今日中國，舊人有學無術；新人有術無學，識見很好而論斷錯誤，即因所根據之材料不足”^②。陳氏所說的“學”指史料，“術”指方法。舊人只有材料而沒有好的方法，失之僵滯，固然難有所為，但新人不依據材料簡單套用外國理論進行研究也同樣不可取。陳氏的批評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三、這套“選本”突出教學性質，明確教材定位

這一點在開頭就已作了明確定位，並且在前面也多少有所涉及。落實到編選上，就是突出和強調中國語言文學歷時演變的規律和特點，通過其發展流程的客觀呈現，與“通史”教材的配套對接，形成彼此互動互補的關係。這不僅在作品選擇上打破原有單一的“語言文學經典”取捨標準，而且採用“語言文學經典”與“語言文學史經典”雙綫兼容的編選原則。這樣，一些當年曾產生重要影響而思想藝術諸方面存在明顯欠缺或不足的作品就被我們納入了視野。如劉心武的

^① 參見：《文學批評的語境與倫理——第二屆“今日批評家”論壇紀要》，《南方文壇》2012 年第 1 期。

^② 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中華書局 2010 年版，第 367 頁。

《班主任》，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它在藝術上當然不免粗糙，還明顯打上那個時代的烙印；但從當代中國語言文學史的角度看，却是無法完全繞開的一個代表作。史料也同樣如此，為體現歷時演變的規律和特點，既注重與文學史的發展流程吻合，特別選取對於文學史發展起到關鍵作用的“經典史料”，也關注具有原創價值的新出土和域外新傳入的“新史料”。如“古代文學卷”中的唐代文學駢文部分，就恰當地利用了大詩人之渙墓志、韋應物墓志，與邊塞詩人岑參密切相關的新疆吐魯番出土的“馬料賬”，還有日本正倉院的《王勃詩序》中所收的《滕王閣序》等。這與以前同類教材中的“作品彙評”和“資料長編”式完全不同。現有的中文“選本”往往大同小異而內涵又比較緊仄，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教師的教學，也不利於拓寬學生的知識結構。我們這樣做，其意是想選擇這樣一種“文史互證”、“雙綫兼容”的新的範式，更好地反映中國語言文學豐富複雜的存在和發展，與“通史”教材對接；同時也為教師和學生進一步的闡釋與發掘，留下足夠的空間。

總之，在選什麼、怎樣選問題上，包括內容、體例、篇幅，也包括作品與史料以及彼此內在關係和邏輯關聯等，都與“通史”教育乃至整個中文教育大系統聯繫起來予以通盤考慮，服從並服務於教學和人才培養的需要，按照教材編寫規律和原則辦事。也就是說，一方面要考慮“選本”自身的獨立性、新穎性和完整性，努力構建適合專業教育需要的一種新的範式；另一方面又要考慮與“通史”教育相連接，成為“通史”很好的配套教材。也只有與“通史”聯繫起來進行綜合考慮，“選本”所選的有關“作品與史料”才能被有效地激活，充分凸顯其意義和價值。從中文教育和教材編寫的角度看，“選本”與“通史”應該是相輔相成，它們分則各自成章，合則融合無間，是一個既獨立又統一的有機的整體。

當然這是就總體而言，具體到各學科、各分卷情況也不完全相同。如語言文字學與文藝學，作品與史料往往就聯結在一起，很難區分和切割。就說文學吧，彼此的差異也頗大。如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特別是古代文學，其作品與史料具有較強的經典性、恆定性；它們所選的作品，往往既是“文學經典”又是“文學史經典”，是兩個“經典”的合一。而在現當代文學那裏，作品與史料則表現出明顯的非經典性（或泛經典性）、不穩定性，其所謂的“文學經典”與“文學史經典”經常是分離的，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只能稱之為“文學史經典”而很難說是“文學經典”。這裏有學科方面的原因，也與它們彼此的生存和發展的社會文化語境有關。這無疑給我們編選帶來了一定的難度。中國語言文學原本就是一個無限豐富複雜的浩瀚世界，為了尊重並還原呈現這種原生態，以滿足研究型教學和人才培養之需，我們採取求同存異的原則，即在保持全書基本統一的前提下，盡量尊重各學科的特點和各分卷主編的個性。

這套“選本”凝聚了浙大中文系諸多同仁的心血，也融入了他們對教學、研究

和人才培養的諸多思考。從 2010 年下半年醞釀、提出並分頭編選，最後復又討論、定稿，在此期間我們各司其職而又通力合作。借此機會謹向同仁們表示由衷的感謝，正是大家的敬業、支持和努力，才使這一編寫計劃得以圓滿完成。同時，我還要感謝浙大出版社副總編樊曉燕女士、黃寶忠先生以及責編宋旭華先生，他（她）們自始至終、傾心盡智的參與、謀劃和把關，也對本叢書的編選及其按時保質出版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促進作用。

浙大中文系從 1920 年之江大學國文系“源頭”算起，迄今已有近百年歷史。與海內外諸多兄弟院系一樣，浙大中文系目前既面臨良好的發展際遇，又遭遇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在這樣一個新的歷史“拐點”上，如何在繼承傳統、教書育人的基礎上，根據時代社會發展的需要，為國家培養具有較深厚基礎和較強創造精神的中國語言文學方面的人才，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光榮使命，也是我們應盡的職責。我們這次推出的這套由集體合作編寫的“選本”，就是冀望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研究型教學和教材編寫是近些年議論較多的話題，也是不少同行感興趣而又衆說紛紜的一個話題。作為一個傳統老系，我們願意在這方面進行探索，也很希望聽到來自各方面的聲音，以期將來重版時把它修訂得更好一些。

2012 年 2 月 5 日於浙大中文系

目 錄

尚書·堯典(節選)·····	(1)
史料選·····	(2)
論語(節選)·····	(9)
史料選·····	(11)
《孟子》(節選)·····	(17)
史料選·····	(18)
《莊子》(節選)·····	(23)
史料選·····	(25)
司馬遷	
史記·太史公自序(節選)·····	(30)
史料選·····	(33)
毛詩序·····	(38)
史料選·····	(40)
王 逸	
楚辭章句敘·····	(45)
離騷經序·····	(48)
史料選·····	(49)
王 充	
論衡·超奇·····	(55)
史料選·····	(60)
曹 丕	
典論·論文·····	(64)
史料選·····	(67)

陸 機	
文 賦	（ 70 ）
史料選	（ 77 ）
沈 約	
宋書·謝靈運傳論	（ 81 ）
史料選	（ 85 ）
劉 勰	
神 思	（ 89 ）
風 骨	（ 93 ）
序 志	（ 96 ）
史料選	（ 99 ）
鍾 嶸	
詩品序	（ 106 ）
史料選	（ 115 ）
陳子昂	
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 123 ）
史料選	（ 125 ）
王昌齡	
詩格(節選)	（ 127 ）
史料選	（ 130 ）
杜 甫	
戲爲六絕句	（ 134 ）
史料選	（ 137 ）
皎 然	
詩式(節選)	（ 141 ）
史料選	（ 146 ）

韓 愈	
答李翊書·····	(149)
史料選·····	(151)
司空圖	
二十四詩品·····	(157)
史料選·····	(162)
歐陽修	
答吳充秀才書·····	(177)
史料選·····	(180)
蘇 軾	
書黃子思詩集後·····	(183)
史料選·····	(185)
李清照	
詞 論·····	(191)
史料選·····	(193)
姜 夔	
白石道人詩說(節選)·····	(197)
史料選·····	(200)
嚴 羽	
滄浪詩話·詩辨·····	(203)
史料選·····	(207)
元好問	
論詩三十首(節選)·····	(211)
史料選·····	(216)
祝 堯	
古賦辨體·····	(222)

史料選	(229)
何景明	
與李空同論詩書	(234)
史料選	(237)
王世貞	
藝苑卮言(選錄)	(242)
史料選	(246)
李 贄	
童心說	(253)
史料選	(255)
王驥德	
曲律(選錄)	(259)
史料選	(268)
馮夢龍	
敘《山歌》	(271)
史料選	(272)
金聖歎	
讀第五才子書法(選錄)	(275)
史料選	(277)
李 漁	
閒情偶寄·詞曲部(選錄)	(282)
史料選	(293)
葉 燮	
原詩(選錄)	(295)
史料選	(306)

王士禛

- 鬲津草堂詩集序…………… (312)
史料選…………… (314)

劉大櫛

- 論文偶記(選錄)…………… (318)
史料選…………… (322)

周 濟

- 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 (326)
史料選…………… (327)

劉熙載

- 藝概(節選)…………… (330)
史料選…………… (334)

況周頤

- 蕙風詞話(節選)…………… (338)
史料選…………… (343)

梁啟超

-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349)
史料選…………… (354)

王國維

- 人間詞話(節選)…………… (360)
史料選…………… (364)

尚書·堯典(節選)

[解題]

《尚書》是商周文獻史料的匯編，先秦時期稱為《書》，漢代始稱《尚書》，亦稱《書經》，乃儒家五經之一。秦火之後，漢初博士伏生傳《尚書》二十八篇，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成，稱為《今文尚書》。相傳漢景帝時，魯恭王劉餘擴建宮殿，壞孔子宅，於壁中發現用先秦文字寫成的《古文尚書》，比《今文尚書》多出十六篇。東晉元帝時，梅賾獻《古文尚書》五十八篇，其中析出《今文尚書》三十三篇。梅本流傳至今，但學界已證明其偽。

《堯典》是《尚書·虞書》中的一篇，偽《古文尚書》將這一篇的下半部分分出，另加二十八字，命名為《舜典》。以下是《堯典》中的一段文字，它並非堯舜時代的真實語錄，而應是由先秦史官追述而成，反映了先秦時期的文藝理論思想。“詩言志”是中國古代詩歌理論的“開山的綱領”(朱自清《詩言志辨序》)，對後世詩歌理論產生了深遠影響。經過歷代文論家的闡述，“志”的涵義愈發豐富，它一方面指詩人的思想感情，衍生出“詩緣情”的觀點，注重內心情感的抒發；另一方面與儒家詩教相結合，與“情”相對，主張“止乎禮義”，強調道德教化的作用。這段文字還反映出上古時期詩、樂、舞結合的特點，因而其音樂理論與詩歌理論緊密聯繫。正如《禮記·樂記》所言：“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

帝^[1]曰：“夔^[2]，命汝典樂^[3]，教胄子^[4]。直而溫^[5]，寬而栗^[6]，剛而無虐^[7]，簡而無傲^[8]。詩言志^[9]，歌永言^[10]，聲依永^[11]，律和聲^[12]。八音克諧^[13]，無相奪倫^[14]，神人以和^[15]。”夔曰：“於^[16]！予擊石拊石^[17]，百獸率舞^[18]。”

(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尚書正義》，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版)

[注釋]

[1]帝：舜。 [2]夔：堯舜時期的樂官，負責樂舞之事。 [3]汝：你。典樂：掌管音樂。 [4]教胄子：教育天下的子弟，使其成長。胄，長，《史記·五帝本紀》作“穉”。 [5]直而溫：正直而溫和。 [6]寬而栗：寬大而莊嚴。栗，堅實之貌。 [7]剛而無虐：剛強而不肆虐。 [8]簡而無傲：簡樸而不傲慢。傲，《漢書·禮樂志》作“敖”。 [9]詩言志：詩可以表達人的意志。志，《史記·五帝本紀》作“意”。 [10]歌永言：歌可以延長詩的語言和意蘊。永，《史記·五帝本紀》作“長”，《漢書·藝文志》作“詠”。 [11]聲依永：聲音的高低曲折又與詩之長言相依存。聲，即宮、商、角、徵、羽五聲。 [12]律和聲：音律用來調和歌聲。律，即六律六呂，中國古代之

音律體系。[13]八音克諧：八音能夠和諧。八音，原指中國古代八種樂器材料，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周禮·春官·大師》後來也有不同的分類方法，有時也泛指音樂。克，能夠。[14]無相奪倫：不要擾亂次序。倫，次序。[15]神人以和：神與人能夠通過詩歌音樂達到和諧。[16]於：音烏，嘆詞。一說“於”為“如”，與下句相連。[17]予擊石拊石：我擊拊石磬。予，我。拊，輕輕擊打。石，石磬。[18]百獸率舞：百獸有感於樂歌，相率而舞。

史料選

《詩》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襪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爲刺。（《國風·魏風·葛屨》）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棗。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小雅·四月》）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大雅·崧高》）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大雅·烝民》）

（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毛詩正義》，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版）

《易》

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乾·文言》）

賁。亨。小利有攸往。《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以小利有攸往。剛柔交錯（據別本補），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賁》）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離》）